

# 明妮·魏特琳与血腥恐怖中的金女大难民营

陆束屏<sup>1</sup> 文 王山峰<sup>2</sup> 译

(1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 林肯 68501)

(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 南京 210017)

**摘要:** 1937年夏天,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日军沿长江下游向南京进发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暴行,这些肆意屠杀、强奸、抢劫和纵火的暴行在南京陷落之后达到顶峰。美国传教士和教育工作者明妮·魏特琳留在了陷都南京,以极大的勇气英勇地面对了这场大屠杀。她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改作难民营,为一万多名饱受惊吓的妇女和儿童提供住所、食物,给她们以安全保护。她努力工作,不屈不挠,常置自身的安全于不顾。她在血腥恐怖之中展露的非凡勇气使人们在她悲伤地离世之后永远记住这位南京大屠杀时期的观音菩萨。

**关键词:** 明妮·魏特琳; 南京大屠杀;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难民营

## 南京大屠杀

1937年7月7日,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在北京附近爆发的数周之后,战火迅速蔓延到上海地区。8月9日,造成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一名中国士兵死亡的虹桥机场事件,加剧了中日双方的紧张局势。8月13日早晨,日本方面宣称中国狙击手向日军巡逻兵开枪,遂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动了小规模进攻。零星的冲突逐渐升级之际,双方均增援了大批部队到上海。随后的几天,中国方面四个师的兵力和数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上海的街道上展开了巷激战。

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基本上处于攻势,持续向日军阵地发起攻击,试图将日军驱逐出上海。然而,中国军队给日本海军陆战队造成的强大压力,随着8月23日日本两个师团在位于上海北部的长江口登陆而缓解。中国军队的大部迅速向北奔袭,以阻止日军增援部队登陆。由此,战场的重点转移到乡村地区,中国军队则处于守势。

战争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一个城镇有时数易其手。在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不顾重大伤亡而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坚守着日益缩小的阵地,与日军逐街逐屋地争夺,直到11月初日军在上海南北两地增援的几

个师团登陆为止。随后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入日军之手。

中国守军从上海仓促西撤的过程中,由于通讯联络失误,加之组织不力,引发了灾难性的混乱局面,因此,中国军队在上海以西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日军充分利用这一时机,迅速追击溃退的中国军队,长驱直逼中国的首都南京。

日军沿着长江下游西进的过程中,在经过的城市、乡镇和村庄犯下了一系列暴行。日军不问情由地大肆屠杀平民、到处搜寻强奸妇女、焚烧民居、肆意抢劫。

11月19日苏州沦陷。翌日,有人目睹日军在一个名叫梅巷<sup>[1]</sup>的郊区小村庄内搜捕并处决了60名农民。11月22日,日军攻占了无锡。以下的这份报告描述了这一天在无锡郊区一座村庄发生的情况。

有一百多名日军士兵将38名百姓驱赶到那里并四面将其围住。这群人当中有两名女性,一位是十七岁的未婚少女,另一位是孕妇。他们被带进不同的房屋遭受了“鬼子”的轮奸,她们在遭受折磨之后虚弱得不能站立。

强奸完了这两名女性之后,日军开始了纵火和集体杀戮。几个日本兵将两位遭受强暴的女性拖拉

回院子,另外一部分士兵下手焚烧所有的房屋。

日军将一把扫帚插入年轻女子的下体并用刺刀戳刺她。他们剖开孕妇的肚子,从中挑出胎儿。

有三名男子不忍看其房屋被大火焚烧,不顾一切冲破日军的包围圈冲向自己的房子。他们遭到另外几个日本兵的阻止,并将他们赶进火势最大的一间房子。日本兵将房门从外反锁之后一会儿,屋顶在大火中坍塌砸在这些人身。现场的嘈杂和混乱使得一名两岁大的男婴大声啼哭。一个日本兵将其从他母亲怀中夺过来扔进大火中。歇斯底里大喊的母亲惨遭日军刺刀之后被投入河中。其余的31个人被强迫面朝小河跪下。日军用刺刀从后面刺杀他们,扭转刺刀将他们的五脏六腑捅出来,再将他们扔进水里。<sup>[2]</sup>

11月29日常州沦陷之后,日军抓住一名18岁的男子强行将其当做随行苦力为他们搬运行李。因此,他得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日军的所作所为。就在这个小伙子被日军抓获之时,日军还扣留了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日军搜遍了此人全身以图找到些值钱的东西,然后,将他推下河去,并在他浮出水面时将他射杀。还有一次,日军劫持了一名年轻女子。他们迅速将她带至“河边的一个小码头上”,日军随后试图扒下女子的衣服。女子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是日军仍然将她扒得精光,其他日军一边吃午饭一边围观此事并不断的鼓掌和尖叫。女子全力用手帕将自己盖起来,在抵抗日军企图将手帕从她手上抢去时,她坠落河里。日军瞄准她的头部将其枪杀。”<sup>[3]</sup>

最为臭名昭著的暴行是两名日军中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杀人竞赛”。两人约定最先杀满一百人者为胜方。结果,从常州杀向南京时,一人砍杀106人,一人砍杀105人。<sup>[4]</sup>

12月9日,日本侵略军兵临南京城下,从三面包围南京。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守城的中国将士发布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无条件投降。中国城防司令对这一通牒不予理睬,之后,日军发动了最后的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于日军之手。

犹如日军在此前攻占城镇的行径,他们在南京城及周围地区肆无忌惮地施以暴行,其规模之大远

非此前的记录可比。一名美国外交官记述道:

数以千计的日本兵蜂拥进城,犯下难以言说的掳掠与暴戾罪行。根据外籍目击者对我们的叙述,放纵的日本兵犹如一群野蛮之徒蹂躏着全城。全城各处数不清的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屠戮。还听说有些老百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缘由便遭枪杀或被刺刀捅死。<sup>[5]</sup>

日军将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百姓搜捕到城外长江边上数处地点进行集体屠杀。在城内也有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集体屠杀。但是每一次集体屠杀都会有一些人奇迹般的幸存下来并向人们讲述他们可怖的经历。

伍常德是当时南京的一名警察,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他讲述了1937年12月15日在南京城西一座城门外集体屠杀现场死里逃生的经历:

每一次人数为一百多的一群人在刺刀的逼迫下通过城门。他们走出城门时,日军用机关枪扫射他们,尸体倒在斜坡上,滚入护城河里面。没有被机关枪扫射死的人则被日军用刺刀刺杀。在我前面大约有每次人数为一百多的十六批人被逼迫着通过城门,这些人都被打死了。

当我们这一批的100多人被令往城门外走的时候,在机关枪开火之前,我尽快地向前跑,扑倒在地,因而没有被机关枪的子弹射中,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戳中了我的后背。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装死。日军往尸体堆上浇上汽油放火焚尸之后离去。<sup>[6]</sup>

大屠杀期间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约翰·吉勒斯皮·马吉记录了另外一次集体屠杀幸存者的经历:

他叫刘康威,是下关的模范村四所村中国圣公会教堂的新教徒,日军占领南京前,他随其他教友一起躲进了安全区。1937年12月16日,他与其他13位教友一起被日军抓走,随后,他们被撵进一拨大约有1000人(据他本人估计)的队伍并被押往下关江边,他们在码头附近一字排开,日军随后进行了机枪扫射。天已黄昏,由于身后又有长江,加之三面是日军的机枪,根本没有机会逃脱。刘康威站在队伍的最后边,紧靠着江边,随着队伍中不断地有人倒下,刘虽然没有受伤,但也跟着倒了下去。他卧在浅水里,隐藏在他周围的尸体下面。就这样坚持了三

个小时。他感觉江水冰冷刺骨,以至于站起来的时候几乎已不能行走。但是,他挣扎着走到一间被遗弃的屋子,找到了一点铺盖。<sup>[7]</sup>

唐顺山是一名鞋匠,他讲述了他从最野蛮最恐怖的砍头屠杀中逃生的经历:

四个日本兵来回走动,将指派给他们的那一组中国人的头颅砍下,另外四个人,包括汉奸,捡起砍下的头颅,排成一行。换句话说,这四个小组是在进行一场砍头比赛。三排受害者背对着土坑一字跪开。唐在他那一组最后一排的末尾,这个位置离坑最近。日军士兵从第一排东侧开始砍杀时,很多人发出了哭喊声和尖叫声,另一些人则因为惊吓过度而一动不动。随着一颗颗人头被砍落,鲜血四溅,身躯应声倒地。人头在后面排成一行。

第一排的第七人即最后一人是个孕妇。日军想在杀她之前先行强奸,遂将她从队伍中拖出并带至十米外的一个地方。在他试图强暴孕妇之时,这名女子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并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兵随即用刺刀戳进她的腹部。在她的肠子流出之际她发出了最后的尖叫。然后这个日本兵又用刺刀挑脐带清晰可见的胎儿,再将胎儿摔在一旁。

第八个人是第二排西端的一名男子,此人在唐顺山的正前方。他的人头被砍掉的瞬间,尸体向后倒下,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将唐撞入坑里。他依稀记得他的头部被无头尸体的衣服盖住,但随即失去了知觉。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一定是因为极度恐惧昏迷过去了。

当他苏醒的时候,他躺在防控掩体内,一位朋友照料着他。这位朋友在服装厂里的一座房屋内目睹了这场恐怖屠杀的全过程,并解释说在屠杀结束后,日军将尸体扔进大坑,同时,一直来回走动,用刺刀戳刺在他们看来任何有生命迹象的人。在丧失意识的情况下,唐顺山被刺中五处——后背一处、左臂一处、左小腿两处和他的左大腿一处——但当时没有任何知觉。日军离开后,他的朋友到现场查看,就在那时发现唐顺山轻微动了一下,但是直到将他满身血污洗净之后,朋友才认出他是唐顺山。<sup>[8]</sup>

根据1948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认定“在日军侵占南京之后最初的六周内,南京

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超过200,000人”,根据“埋尸团体和其它慈善机构的总共埋尸超过155,000具记录”可知上述人数并不夸张。这个埋尸数字“尚不包括被日军毁尸灭迹、丢弃长江以及日军通过其它方式处理的尸体。”<sup>[9]</sup>

除了肆意的屠杀,日军还纵情抢劫。日军抢劫任何可以随手带走的東西,不停劫掠各处房屋、建筑、院落中抢走各种值钱的东西,不管这些物品是小到可以装进口袋的铜板、银币,还是大到家具、钢琴、汽车,或是商店、仓库里的大批货物,均悉数劫走。没有一处商店免遭破坏,很多商店被日军驾着卡车来洗劫一空。<sup>[10]</sup>

在南京,没有一处房屋或者建筑未遭日军闯入和抢劫。美国驻华使馆副领事詹姆斯·艾斯比在1938年1月6日抵达南京后描述了南京被抢劫的情况:

无论这座院落、房屋、商店或建筑物是外国教会的产业,还是外国人或中国人个人的房产,悉数被闯入,并在不同程度上被洗劫、掳掠。众所周知,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大使馆被闯入,物品被抢走。据报告,意大利大使馆的遭遇也一样。1月1日,俄国大使馆被神秘地大火焚毁。我们察看过的,或美国居民报告的美国房产无一例外地被日本兵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闯入。甚至现在有美国人居住的住宅也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撰写这份报告时为止,美国居民与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仍持续不断地将闯入外国人房产,搜寻财物与妇女的日本兵驱赶出去。<sup>[11]</sup>

如果说随意的屠杀和猖獗的抢劫加剧了笼罩在南京上空的恐怖的话,大范围的纵火则给中国的首都带来了目之可见的物质损害与摧残。纵火焚烧异常猖獗并蔓延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有些情况下,日军驾驶着卡车将商业区的商店和仓库内的商品洗劫一空,随后将空无一物的商店付之一炬以掩盖其抢劫的行径。根据艾斯比的报告,纵火或其他原因任意造成的焚烧遍及全城。在许多街道上,间隔在完好的房屋之间,有些房屋建筑被完全烧毁。一条街道上,一、两栋,或更多的房屋只剩下焦黑的残壁兀立着,而边上的其他建筑却没有被大火触及。

城南的火患最为严重。巡视了南京这片商业闹

市区,看到成片街区的房屋建筑被烧毁。许多街区中仅剩下十来栋或更少的房屋兀立着。与整个城区几乎完全遭焚毁的上海闸北<sup>[12]</sup>不同的是,可以看出这里通常是主要街道上临街的建筑被焚毁,而后面的房屋大都没有被烧到。<sup>[13]</sup>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刘易斯·斯迈斯说日军进城后的一个月之内,日军士兵“烧毁了城内四分之三 的商店(大商店无一幸免,仅有部分小商店幸存),所有的商店遭到了彻底的抢劫。他们现在正在通过火车将所有抢劫的东西包括受损的汽车等等运往日本。”<sup>[14]</sup>

金陵大学附属医院美籍传教士詹姆斯·亨利·麦卡伦估计了城中因为大火造成的损失,“医院到中正路和白下路,约有 30% 的建筑被毁。白下路上的损失约为 50%,中华路到健康路约有 80% 的建筑受损——再往南,情况好些,城市最南端没有很多建筑被焚烧”。与此同时,“从鼓楼到东城墙的一段区域约有 20% - 30% 的房屋受损严重,受损的情况集中在某些区域”。<sup>[15]</sup>

#### 对女性的暴行

对女性的暴行是非常猖獗并令人惊骇的。被放纵的日军四处寻找强奸妇女。下至 11 岁的稚嫩少女上至 60 岁开外的老嫗均成了日军士兵肆意纵欲的牺牲品。很多情况下,女子被强奸之后惨遭杀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此作出简要的概述:

发生了很多的强奸事件。稍有不从的受欺凌者或者试图对其进行保护的家人都会被立即处死。全城各处从幼弱女孩到高龄老嫗的大批妇女被强奸,很多强奸案中还伴随着变态的施虐行为。很多女性在遭受凌辱之后被杀死,肢体支离破碎。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的第一个月内大约发生了 20,000 多起强奸案。<sup>[16]</sup>

在日军的占领下,对女性来说每天的日子如同地狱。根据史密斯的估计,在暴行发生的高峰期,那两天每晚肯定有 1,000 多名女子被强奸,也许在白天也有数量相等的强奸案发生,就发生在安全区里!年轻女子和一些年龄稍大的妇女一旦被日军抓住便无从幸免。牧师的妻子们,大学教师的妻子们,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不加区分,长得漂亮者首当其冲。最发指的记录是神学院内一名女子被 17 名士兵强

奸。在美国,人们耳语“强奸”。对我们这几乎是家常便饭!大批强奸案骤然而至,来不及记录,以至于我不得不开始伏案将它们速记下来。<sup>[17]</sup>

留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威尔逊·普卢默·米尔斯描述了城内女性遭受的苦难、恐惧与痛苦“如果你见到成群的妇女清晨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处她们认为会比前一天遭遇的恐怖夜晚稍微安全一些的住所,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心如刀绞。的确确有成千的强奸案发生了。”<sup>[18]</sup>

马吉牧师用他的 16 毫米摄影机记录下了最为血腥最为野蛮的强奸谋杀案。马吉还提供了书面材料来诠释摄制的画面:

1937 年 12 月 13 日,三十名日军来到南京城东南新路口 5 号一户人家敲门。户主是一名哈姓穆斯林,哈先生开门后,立即被他们用左轮手枪打死。哈先生死后,房客夏先生跪在日军面前乞求他们不要再伤害其他人,也被日军用左轮手枪打死。哈太太在质问日军为何杀死他丈夫时被日军枪杀。抱着一岁的女儿躲在客厅桌子下面的夏太太被日军拖拽出来。在被强行脱光衣服并遭数名日军轮奸后,夏太太的胸膛被日军用刺刀戳穿,还在她的下身插上了一个瓶子,并用刺刀刺死婴儿。日军随后进入了隔壁夏太太父母和女儿的房间,夏太太的父亲七十有六,母亲也七十有四,两名女儿则是 16 岁和 14 岁。日军企图强暴这两名姑娘,外祖母上前保护,但被日军用左轮手枪射杀。外祖父抱住他妻子的尸体,也被杀害。随即,两个女孩被剥光衣服,姐姐被 2-3 名日军奸淫,妹妹则遭 3 名日军强暴。日军奸淫完姐姐后将她刺死,还在下身插入一根藤条。妹妹也被刺死,只是没有受到像姐姐和妈妈那样更灭绝人性的对待。后来,士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躲在同一房间里的另一个七八岁的妹妹。在这栋住宅中最后被杀死的是哈家两个分别为四岁和两岁的孩子。4 岁的孩子被刺刀刺死,日军用军刀将两岁的孩子从头向下劈成两半。那个八岁的小孩受伤后爬进隔壁的房间,那里躺着她母亲的尸体。她在那儿同没有受伤的 4 岁妹妹一起待了 14 天。两个孩子靠着炒米和锅里的一点锅巴活命。摄影者从这位小姐姐的口中了解到了以上报告的一部分情况,孩子的叙述证实了一个邻居和亲戚叙述的一些细节也修正了他

们讲的另一些细节。这孩子还说,日本兵每天都到这所房子里抢东西,因为她们俩藏在旧床单下面,所以日军始终没有发现她俩。<sup>[19]</sup>

在南京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美国传教士乔治·阿什莫尔·费区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了很多强奸案。1937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他记录说“粗略估计昨天白天到晚上大约至少有1000名女子遭到了强奸。其中一名可怜的女子被强奸了37次。另外一名女子五个月大的婴儿被日军蓄意地闷死,以阻止婴儿在他强奸母亲时啼哭。反抗就意味着刺刀。”<sup>[20]</sup>12月18日,费区说当他与金陵大学教授里格斯和另一名美国人共进晚餐的时候,里格斯教授家中有两名女子被日本兵强暴,其中一名是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表姐。<sup>[21]</sup>12月22日,里格斯教授家中再次发生强奸案。“晚上,用完晚餐后我跟里格斯教授步行回家——就在我们到家之前一名54岁的女子在里格斯教授家中被强奸。”<sup>[22]</sup>1937年圣诞节那天,费区记录7个日本兵整个夜晚,以及前一天夜晚都呆在金陵女子神学院内强奸妇女,一名12岁的女孩在邻近我们的住所里被三个日本兵强奸,另外一名13岁的女孩也被强奸。”<sup>[23]</sup>12月27日,费区写道“昨晚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开车来到金陵大学,在校园里强奸了三名女子,并虏走一名妇女。金陵女子神学院被闯进多次,老百姓遭抢劫,20名女子被强奸。”<sup>[24]</sup>

在一封日期为1938年4月2日的信中,马吉表示,

我将另外一名15岁女孩送到医院的时候,她对我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她的哥哥、嫂子、姐姐和父母就在她面前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了,她则被日军虏掠到一个有两三百人的军营中。她随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不给她衣服穿,每天被日军强暴数次,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半月,直到她生病,日军不敢再玩弄她。她告诉我有她这样被关在那儿遭遇的女孩还有几个。我曾和一名被强奸过两次的76岁老嫗交谈,她说她女儿是个寡妇,到底被强奸了十八次还是十九次,她已弄不清楚。就我个人所知,这是强奸案中年龄最大的受害者,但是一名女教友告诉我,曾有一名和她住在一起的81岁的老嫗,日军要她宽衣解带,老嫗说自己太老了,结果被日军一枪

打死。我用教会的福特车一车又一车将遭受强奸的妇女们送到医院去接受治疗,她们当中最小的只有十岁或十一岁。<sup>[25]</sup>

金陵大学另一位美籍教授贝德士在给妻子的信中列出了一系列的强奸案,“他有每天都发生的20多起强奸的详细记录”,其中包括“昨晚一位在金大附中避难的72岁老嫗被强奸”,以及“两名在金大避难的女孩在返回家中后的第一晚因为拒绝了日军士兵的要求而被杀害。诸如此类的事情每日都有很多!骇人听闻的性虐待案件也为数不少,是日军兽欲和暴行最明显的见证”。<sup>[26]</sup>

目睹了如此多恐怖的强奸事件,美国传教会的传教士厄内斯特·福斯特告诉他的家人说“强奸案每天都有发生,日军对待中国妇女的暴行残暴至极,笔墨已不能形容。”<sup>[27]</sup>他说“很难想象人世间会有这样的魔鬼存在,但是,可以提起的惨案一桩接着一桩。”<sup>[28]</sup>

明妮·魏特琳: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和教育工作者

南京遭受日军攻击,施以暴行之际,有27位西方人士选择留在南京城内。1937年12月15日和16日五名美国和英国记者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之后,留下的22位外籍人士致力于建立并管理一个安全区,以期给中国难民提供保护使其免遭日军暴行的伤害。这22人中,有14名美国人,他们分别是金陵大学的贝德士、里格斯、斯迈斯教授,金陵大学附属医院的威尔逊、特里默、鲍尔、海因兹,美国圣公会牧师福斯特、马吉,美国北长老会牧师米尔斯,全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牧师麦卡伦,金陵神学院的索恩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sup>[29]</sup>

这些美国人或者参与建立安全区内的难民营,或者在医院内救治和照顾伤病员。魏特琳兢兢业业地工作,竭尽全力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改变成供妇女和儿童使用的难民营。

魏特琳,1886年9月27日生于美国典型的中西部乡村小镇,伊利诺斯州的塞克尔。虽然在她生命的前26年之中从未去过离家家乡100英里之外的地方,但是她在1912年从伊利诺斯大学毕业之际,勇敢地响应教会的号召,前往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去做一名女子教会学校的教师和校长。由于魏特琳

在女子教会学校五年的卓越服务成绩以及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于1919年邀请她去任教。

建校于1915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可以向女性颁发学士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1919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德本康夫人赴美为学校筹款期间,魏特琳填补空缺,任代理校长一职达18个月。

对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说,魏特琳是个完全的陌生者,但是她在代理校长一职任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除了行政管理和教学课程之外,魏特琳还参与了新校园的规划、参与购买新校址土地的谈判以及处理因五四运动引起的学生罢课事宜。<sup>[30]</sup>

与此同时,她创立了教育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一个全新的科系。<sup>[31]</sup>她尽力争取经费来招募教师和开设新课程。当德本康夫人回到南京时,魏特琳的职责便转到负责教育系的行政管理和教学事务。

魏特琳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教师。她深知保持正规教学方法训练和学生未来所教专业课程精通程度两者之间平衡的重要性。多年来,她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到教育系来上课。学生则在教学方法和对未来事业的信心两方面受益良多。<sup>[32]</sup>

魏特琳同样熟知为学生们未来的教学提供实践机会的重要性。1924年,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内开设了隶属于教育系的附属实验中学。学生走进社会从事教学工作之前,附属实验中学为他们提供一个进行教学实习,学习教学技巧的方便的培训基地。<sup>[33]</sup>

根据她在合肥女子学校的经验,魏特琳非常清楚地知道教师可能面对的问题。她时常走访不同地区的学校,让自己熟悉这些学生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可能任教的地方和环境。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学生在学业上和精神上都更充分地做好准备。<sup>[34]</sup>

魏特琳还十分重视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附近地区居民发展友好的关系。魏特琳时常拜访附近地区的街坊邻居,不仅熟悉这些居民,也经常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魏特琳的蓝领家庭背景使得她很容易和这些贫穷的居民打成一片,获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当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危在旦夕之际,魏特琳率

先邀请邻居中的妇女和儿童,以及几户人家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作为回报,很多邻居帮助魏特琳维护管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

魏特琳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教育者和管理者,也是一名出色的传教士。魏特琳坚定的基督教信仰使得她在恶劣的环境中也充满信心和力量,并且帮助她克服了很多困难,解决了很多问题。作为一所教会学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学业上的教育,<sup>[35]</sup>它是一所“为中国逐步成长的妇女界培养热情而无私的宗教领袖”的高等教育机构。<sup>[36]</sup>除了正常的宗教学习和每周一次为学生的布道,教授们以身作则,通过言传身教来影响和鼓励学生为他人服务,并从物质和精神上去帮助穷人。魏特琳鼓励学生帮助附近的邻居。她们的宗教信仰和责任感促使她们建立起一座社区学校,为贫困的居民提供一个受教育的机会。魏特琳也经常周日去学校上课。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学校扮演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邻居们交流中心的角色。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为难民营之后,魏特琳也没有忘记她的传教职责。在难民营内她组织了为期六周面向妇女和姑娘的圣经学习班。这一活动受到了热烈欢迎和广泛参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为她们提供食物、庇护场所、教育和精神安慰。

保护妇女和儿童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

魏特琳在华期间最为无畏也最让人值得尊敬的贡献无疑是她建立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在日军侵占南京之后最恶劣的那几周时间内,成千上万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百姓被屠杀的时候庇佑和保护了一万多妇女和儿童。

在得知华北地区战争打响之后,正在南京以北几百英里远的海滨城市青岛度假的魏特琳立即返回了南京。她下意识地即将到来的新学期而担心。当战火蔓延到上海的时候,教育部建议上海、南京、杭州及周边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延期开学日期至9月20号。<sup>[37]</sup>随着战争的持续,情况恶化,很明显入学日期将无限期后延,更糟糕的是,沿海地区的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不得不迁往内地。经过几番商量和讨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决定一分为三,分别迁往上海、湖北武昌和四川成都。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军占领了更多的地区,上海和武昌校区最终并

入成都校区。在南京仅有少数教职员留在本部护卫着校园里的建筑、设备、家具和书籍。

随着日军逼近南京,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提议成立南京安全区以便战火烧到南京时为中国难民提供保护。安全区内的大学、中学、政府机构以及其它公共建筑被选用为难民营地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处在安全区的范围之内,并被指定为专门收留女性和儿童的难民营。

1937年12月2日,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的吴贻芳去了武昌,留守的魏特琳和其他一部分人组成紧急委员会管理学校。魏特琳和工作人员立即组织和安排难民营的各项工作,为难民的进住做好准备。他们打扫了六幢建筑并将家具腾出去。

当日军抵达南京城下的时候,大火和炮击给房屋造成的破坏以及危险的战争形势逼迫很多人撤家舍业蜂拥至城内寻求庇护。12月8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正式开门收留难民。开门首日即有300名妇女和儿童进入难民营,随后难民数字激增。1937年12月13日日军入城后开始屠杀、强奸、抢劫和纵火,受到此恐怖惊吓的妇女成群结队的涌入,直至各幢建筑均挤满了人。甚至阁楼、走廊、门厅、楼梯上都挤满了人,最后,廊沿和有屋顶的走道上也挤满了人。难民们只要被允许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便心满意足,哪怕是只能睡在露天,因为安全区外的环境实在是太危险,太恐怖了。

每天早晨,魏特琳早早地站在校园前门口,检查接收那些昨晚经历了言语无法形容之残暴的成群结队的妇女们。对于这些永难忘记的场景,魏特琳做了详细的记录:

我们开始意识到日本兵在疯狂地搜寻年轻姑娘,妇女留在家中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我们敞开大门,任她们蜂拥而入。以后几天,对妇女来说情况越发糟糕,她们从破晓时分便涌进来。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涌进门时年轻姑娘的面容——她们中绝大多数在大门口和父亲与丈夫分别。她们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假扮自己——许多人剪掉头发,大多数人把脸抹黑,很多人穿上男人或男孩的服装,或是穿著老年妇女的装束。王先生、夏先生、玛丽和我在大门口待了几天,试图把游手好闲的人挡在门外,让妇女们进来。在高峰期,我们校园上肯定有一万人。<sup>[38]</sup>

为10 000妇女提供庇护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保护女性免遭日军的暴行更是一项充满了挑战性的任务。鉴于日军军纪松弛,对于中国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子、老人还是年轻人,只要表现出稍有不从或反抗便被屠杀,中国雇员无法有效地阻止日军伤害妇女。当日军士兵进入校园虏掠妇女的时候,中国职员除了向魏特琳报告之外便无能为力了,魏特琳则飞奔到事发地将日军士兵赶走。在那些日子里,无论魏特琳是在进晚餐还是午休,也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只要她接到紧急报告,她都要立即赶过去。人们经常看到魏特琳从校园的一处奔到另一处去驱赶日军。

在这样的情形下,由于发现西方白种人面孔在驱赶日军方面最为有效,魏特琳和已加入中国籍的金陵大学美国教授德威南夫人两人不能同时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二人之中必有一人要留在校园内以驱赶闯入校园的日本兵。<sup>[39]</sup>

然而,白种人面孔也不总是有效。1937年12月17日,日军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搜查中国士兵的名义要求搜查几幢住满了女难民的大楼。他们的真实目的却是寻找年轻女子供他们强奸。当魏特琳拒绝打开一幢大楼的时候,一个日本兵打了魏特琳一记耳光。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魏特琳做了详细的记录:

刚吃完晚饭,中大楼的一个小伙子来说,校园有许多日本兵,正往宿舍楼去。我发现两个日本兵站在中大楼前正在拉门,一定要把门打开。我说没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当兵的。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中国军人。”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相同的话。然后,日本兵打了我的耳光,又重重地打了李先生的嘴巴,并坚持要开门。我指了指边门,带他们进去。他们楼上楼下转了转,大概在找中国军人。我们出来时,另外两个日本兵将我们3个工人绑上带过来,并说“中国兵,”但我说,“不是兵,是苦力,花匠。”他们确实是花匠。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前面去,我跟着他们。到前门见到一大群中国人跪在路旁——陈斐然先生、夏先生,还有几个我们的工人。一名军曹和几个日本兵也在那儿,不久程夫人和玛丽·特威楠也被日本兵带到我们这儿。他们问谁是这所机构的负责人,我说是我。然后,让

我指认每一个人。<sup>[40]</sup>

最后,在日本人将魏特琳和工作人员扣留在前门口的时候,日军借口搜捕中国士兵的最终结果是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掠走了12名年轻姑娘。

日军不断地来骚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或者硬闯校门口,或者翻墙和篱笆闯入校园,或者寻找女子强奸,或者抢劫财物。12月19日,魏特琳接到了许多个紧急报告,不断地从校园的一处跑到另一处,从一幢大楼赶到另一幢大楼。在旧的教师之家,她发现一个日本兵站在538房间门口,另一个士兵正在房间内强奸一名可怜的女子。她将两名士兵都撵走了。另一次,她赶到图书馆北侧,发现一个日本兵将一名女孩虏掠进竹林。<sup>[41]</sup>

12月23日,魏特琳向日本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书:

由美国国旗和美国大使馆颁发的布告清楚地标示为美国财产的三大栋教师住宅,分别被几伙日本兵一而再再而三地搜查、掳掠。由于这些住宅中物品的主人都不在南京,我无法准确地说出损失的程度。通常,我到场告诉日本兵这是美国财产,便能制止掳掠,尽管有两次,我在场时,日本兵照样劫掠。<sup>[42]</sup>

1938年1月21日,魏特琳向美国大使馆官员报告说:

最好向您报告今天下午2点发生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一起事件。事件发生的地方只有一边有学院的篱笆,但篱笆上方挂著美国旗。

除了在上述地点,我们校园里有几个难民的小棚屋。4个日本兵企图将3个住在这些棚屋中的姑娘劫持走。这些姑娘成功地逃到后门,幸好我到场,日本兵看到我就迅速离去。<sup>[43]</sup>

日复一日,从早到晚。魏特琳辛勤地工作着,竭尽所能在困难,有时甚至是危险的情况下保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内的难民。在大屠杀最为危险的那段日子里,魏特琳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院的大门口守卫着,阻止日军进入校园。应她的邀请,每晚有一名男性美国传教士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帮助守护校园。她还让工作人员每日每夜在校园里巡逻。迟至1938年3月8日,她还接受了两三百名妇女和儿童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避难,因为

听说日军“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抢劫钱财,寻找‘花姑娘’<sup>[44]</sup>,人们对此惊恐万分”。<sup>[45]</sup>

除了向妇女提供庇护所,保护她们免遭日军暴行伤害,魏特琳还密切关注难民营内的生活状况。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通过校园内的红十字会粥厂向难民们提供食物。赤贫难民可以免费领取,有能力者仅需付一点点钱即可领受。

管理维护10,000妇女的住所,保持卫生是个巨大的挑战。魏特琳和工作人员尽其所能地保持房屋建筑干净卫生,并且向妇女传授有关公共健康与个人卫生的知识。魏特琳还在校园内开办了一个公共浴池向女难民们提供服务,受到了难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这为难民们在危难之中改善个人的卫生状况提供了极大便利。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内还设有一家小型诊所,由魏特琳的同事和助手程夫人负责,除了为难民们提供基本的医疗救助和医药,还定期分发奶粉和鱼肝油给难民营里的婴幼儿,并为2,000名难民进行了疫苗的接种。<sup>[46]</sup>

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内做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是,为南京沦陷的前几周时间内很多丈夫和儿子被日军带走后至今未归的妇女收集数据,填写请愿报告。其中很多母亲失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位母亲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婿下落不明。很多家庭失去的男子是家里的顶梁柱,因此很多妇女失去了生活来源。从1938年1月24日到2月8日,就有738名妇女提交了她们的数据,从1938年3月18到22日,有1,245名妇女提交了她们的寻人启事请愿报告。<sup>[47]</sup>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将这些数据和请愿报告提交给日本当局,尽管魏特琳和她的同事一再催促,但日本当局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请愿报告也没有任何答复。显然,绝大多数失踪者都已被屠杀。

因为很多妇女没有收入,这些家庭主妇们又没有可供谋生的一技之长,因此魏特琳向那些没有生活收入来源的女子们发放了一些小额的贷款,为那些急需生存技能好重新开始人生的妇女们开设了生存技能培训班,讲授家政课程。事实证明这两项活动极为成功,有效地帮助了那些处于赤贫中的女子。

魏特琳还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内向妇女



们提供学习基督教教义的机会。她感到“苦难、恐怖与摧残使人心柔弱,需要同情和安抚”。<sup>[48]</sup>她希望通过学习圣经和诵唱赞美诗来使妇女坚强,并“在这充满紧张与压力的日子里给她们以安抚”。<sup>[49]</sup>1938年1月17日,在美国传教会牧师的帮助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组织女难民开办了定期的福音传道聚会。因为有几千名女子住在六所大楼里,魏特琳和同事采取发票的方法,使得每一名女子都有机会每周一次参加福音会。每个下午,在小礼拜堂里,大约170名女子聚精会神地听讲和学唱赞美诗。如此一来,每周便有大约1,000多人有机会参与其中。<sup>[50]</sup>

魏特琳非常热情地关注宗教学习活动,并为取得的成功兴奋不已:

圣周之前的六周期间,大约有600-1,000名女子报名参加了学习耶稣一生的课程。这些课程每周上三次课,计划让这些女子们理解圣周和复活节的知识。她们不仅学习耶稣一生的知识,一周还有五个下午以耶稣的教诲为主题的布道。……那段日子精心准备的材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苦难、悲伤,以及除去最最基本的必需品,生活中其他的一切均被剥夺,致使人心柔软,使他们能够理解上帝以耶稣承受为人类赎罪的苦难。<sup>[51]</sup>

她还从上海采购印制的学习材料为妇女们组织圣经学习班。由于妇女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她设置不同级别的班级以适应她们的需求和能力。<sup>[52]</sup>她认真而高效率地工作,以满足难民营内的各种需要。

尽管她事务繁忙,每天的时间都被需要她关注,做决定,给予答复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占去,但她每天仍然抽出时间坚持写日记,忠实地记下每天发生的事。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这些日记非常地珍贵,因为它们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和南京城内发生的情况留下了文字记录。这些日记为后代读者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感受和审视那段恐怖条件下人类苦难遭遇的机会。

她的日记把读者带到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远山谷中的两个池塘。池塘边上,有很多烧焦了的尸体,尸体之间可以看到两个空了的煤油或者汽油桶。烧焦了的尸体的胳膊仍被铁丝绑在身后。<sup>[53]</sup>她后来又去现场进行了一次近距离仔细地查看:

在大池塘边,96个人极其残忍地被处死;在另一个池塘边大约有43个人,附近的农舍里大约有4人。那些农民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先用煤油和汽油浇在身上,然后点火燃烧。逃跑的人被机枪射倒,有4个人痛苦中挣扎着跑到房子里躲避,房子遭焚烧。我们站在小池塘边,看到像是人头顶的一块东西。我们用竹竿和木钩将一具尸体慢慢推到岸边,他穿著老百姓的便装。<sup>[54]</sup>

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写的她收到一份报告说:“红卍字会估计在下关附近有30,000人被杀,同日下午我听到另一份报告说成千上万的人赶到燕子矶,结果发现无船可过江”。<sup>[55]</sup>这一报告被另一个来源的信息证实了,“沦陷的前几日在三岔河有10,000被杀,20,000到30,000人在燕子矶被杀,大约10,000人在下关被杀。她确信很多的丈夫和儿子将不会再回来了。”<sup>[56]</sup>

她在日记中记录了她听说甚至在“1938年4月长江两岸成千上万遇难者的尸体仍未被掩埋,许多军人和平民百姓的尸体已浮肿,顺著江流漂浮而下”。<sup>[57]</sup>她还得知,截止到1938年4月14日,红卍字会“在城里已经埋葬了1,793具尸体,其中大约有80%是平民;他们在城外掩埋了39,589具男、女及孩童的尸体,其中大约有2.5%是平民。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下关和上新河地区在内,我们知道那里还有数目可观的人丧生”。<sup>[58]</sup>

1938年2月23日的日记中,魏特琳再次告诉我们南京附近农村的年轻姑娘的悲惨遭遇:

今天下午,一位母亲带来3个姑娘,乞求我们收留她们。一个是她的女儿,12月初到农村去,另外两个是农村姑娘。她们说,乡村的情况非常可怕,姑娘不得不躲藏在遮盖好的地洞里。为了找到这样的藏身之处,日本兵在地上跺脚,看看脚下有没有空洞的地方。她们说,自从12月12日以来,她们大多数日子便是在这样的地洞里度过的。<sup>[59]</sup>

根据魏特琳的日记,在晚至1938年5月份的时候,城内依然还有屠杀和强奸事件发生。有一名年近50的妇女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婿。1938年5月9日晚上十点钟,两名日军来到她家门前,由于没能推开房门,他们钻窗户进入老妇的房间。日本兵“要强奸她的媳妇。她予以拒绝,并动身去报告宪

兵。他们在她脸上砍了两刀,又一刀刺进她的心脏,致使她伤重而死。”<sup>[60]</sup>

1938年暮春,南京城内情况有所好转,安全区内大多数难民营相继关闭之时,魏特琳依然在管理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然而,由于凶杀和强奸案件时有发生,年轻的妇女和姑娘回家仍不安全。虽然1938年5月31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已经正式关闭,魏特琳仍在此后夏天的三个月里保护和照顾了大约800多名妇女和姑娘。<sup>[61]</sup>除了在9月份启动家庭手工业培训计划帮助妇女们获得生存技能之外,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开设了一个实验中学班为学龄女孩授课。她将 these 项目一直持续到1940年的春天。<sup>[62]</sup>

在大屠杀、强奸、抢劫和纵火横行的日子了里,魏特琳做了一项伟大而极具勇气的工作。在难以言说的恐惧之中,血腥恐怖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魏特琳决心为可怜的妇女和儿童营造一个避难场所,在极其危险和困难的环境下,有时不顾自身的安危,来保护她们免遭日军暴行的侵害,当日军放纵无度,贪得无厌的士兵在全城屠戮时,虽然无法做到绝对地安全,但是,相对说来,在金陵文理学院校园内要比校园外安全得多。魏特琳在南京扮演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角色,人们将永远感激和怀念她。

长期在恐怖和极大压力环境下的工作让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0年春天,魏特琳精神崩溃。不久,她离开南京到美国接受治疗。在医院的治疗看起来似乎有些成效,但是抑郁症根深蒂固,1941年5月14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和她一起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共事的邬静怡表示“她精神崩溃可能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她早年家庭生活的状况,自身身体上生理的变化,饮食不周,战争环境下过度紧张,战争期间在难民营内的过度操劳和对和平运动的失望”。<sup>[63]</sup>

犹如众多的英雄人物,魏特琳为人类的尊严,尤其为保护妇女的安全而英勇地生活和工作着,尽管她自己却悲剧性地离世。因为这个原因,她被无数南京人称为血腥恐怖中的观音菩萨。她的形象和生平事迹无疑将为人民世代所珍惜,并鼓舞着他们。

注:

[1][2][3][4][日]本多胜一:《南京大屠杀:一名日本记者眼中的日本国际耻辱》,第42-45页、第63-65页、第94页、第125-127页。

[5][美]J. 艾斯比《1938年1月南京之惨状》,1938年1月25日。国务院文件,文件号:No. 793. 94/12674。

[6] 伍常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言,《东京战犯审判》,第二册,R. J. 普理查德、S. M. 扎伊德,纽约:加兰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第605页。

[7][美]约翰·G·马吉《暴行录像解说》,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库,第8组,第263盒,第7文件夹藏。

[8][日]本多胜一:《南京大屠杀:一名日本记者眼中的日本国际耻辱》,第164-165页。关于幸存者的名字,应该为“Tang Shunshan”,而非本多胜一书中记述的“Tang Junshan”,唐顺山的证词亦可参见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1-74页。

[9][美]R. J. 普理查德、S. M. 扎伊德《东京战犯审判(判决书及附录)》,纽约:加兰出版社,1981年版,第49,608页。

[10][美]M. S. 贝德士《1938年1月9日给妻子莉莲的信》,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库,第10组,第1文件盒,第8卷。

[11][13][美]J. 艾斯比《1938年1月南京之惨状》,1938年1月25日,第10-11页、第12-13页。

[12] 闸北为上海之一区,1937年8月中日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炮击和大火。

[14][美]L. S. C 斯迈斯《1938年3月8日写给朋友的信》,《刘易斯和玛格丽特通信集》,全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图书馆,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15][美]J. H. 麦卡伦《1938年1月1日写给妻子爱娃的信》,《1937-1938年冬日军南京暴行记录》,国会图书馆藏。

[16][16]R. J. 普理查德、S. M. 扎伊德《东京战犯审判(判决书及附录)》,纽约:加兰出版社,1981年版,第49,605-49,606页。

[17][美]L. S. C 斯迈斯《1937年12月21日写给妻子玛格丽特的信》,耶鲁大学神学院特藏库,第8组,第103文件盒。

[18][美]威尔逊·普卢默·米尔斯《1938年1月10日写给妻子妮娜的信》,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库,第8组,第141盒藏。

[19][美]J. G. 马吉:第9案例,第4录像,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库,第8组,第263盒,第7文件夹藏。

[20][21][22][24][美]乔治·费区《1937年12月17日费区日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库,第11组,

第9盒,第202文件夹。

[23]【美】乔治·费区《1937年圣诞节费区日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库,第11组,第9盒,第202文件夹。

[25]【美】J. G. 马吉《1938年4月2日写给麦卡金的信》,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库,第10组,第4盒,第62文件夹。

[26]【美】M. S. 贝德士《1938年2月3日给妻子莉莲的信》,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库,第10组,第1文件夹,第8卷。

[27][28]【美】E. H. 福斯特《1938年2月28日给妻子克拉丽莎的信》,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库,第8组,第263文件夹,第5卷。

[29]【美】陆束屏《他们在南京:英美人士目睹的南京大屠杀》,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5页。

[30][31][32][33][34][37]【美】M. S. 德本康,R. M. 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国教会学校的美国董事会议》,纽约,1955年版,第33页、第32页、第32-33页、第33页、第33页、第91页。

[35][63]吴心怡《东方遇上西方》,马里兰州:巴尔的摩,1985年版,第55页、第55页。

[36]【美】明妮·魏特琳《难民营为尽可能多人提供保护》,魏特琳手稿,藏全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图书馆,第1盒,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38]【美】明妮·魏特琳《第一个月的回顾》,载《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陆束屏编,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伊利诺斯州:厄巴纳,2008年版,第146-147页。

[39][45][47][62]【美】陆束屏《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前言,第24-25页、第179页、第26页、第27页。

[40]【美】明妮·魏特琳《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陆束屏编,伊利诺斯州: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41]【美】陆束屏《他们在南京:英美人士目睹的南京大屠杀》,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163页。

[42]【美】明妮·魏特琳《1937年12月23日给田中的抗议书》,詹姆斯·艾斯比1938年2月28日的报告《美国在宁财产和利益损失报告》之附件2-A(国务院文件,编号:No. 393. 115/233),藏国家第二档案馆,第59组,中央十进制制文件1931-1939,第1821盒。

[43]【美】明妮·魏特琳《给埃里森的信》,詹姆斯·艾斯比1938年2月28日的报告《美国在宁财产和利益损失报告》之附件2-C(国务院文件,编号:No. 393. 115/233),藏国家第二档案馆,第59组,中央十进制制文件1931-1939,第1821盒。

[44]中文翻译为“年轻和漂亮的女孩”。

[46]【美】明妮·魏特琳《1938年1月14日至3月31

日事件之回顾》,载《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陆束屏编,伊利诺斯州: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48][52]【美】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1938年2月28日的报告》,载《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陆束屏编,伊利诺斯州: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第169页。

[49]【美】明妮·魏特琳《难民营为尽可能多人提供保护》,魏特琳手稿,藏全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图书馆,第1盒,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50]【美】明妮·魏特琳《难民营为尽可能多人提供保护》,魏特琳手稿,藏全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图书馆,第1盒,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51]【美】明妮·魏特琳《沦陷区的教堂:以南京为例》,魏特琳手稿,藏全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图书馆,第1盒,田纳西州:纳什维尔。[53]【美】明妮·魏特琳《1938年2月26日之日记》,载《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陆束屏编,伊利诺斯州: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54]【美】明妮·魏特琳《1938年3月25日之日记》,载《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陆束屏编,伊利诺斯州: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55]【美】明妮·魏特琳《1938年2月15日之日记》,载《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陆束屏编,伊利诺斯州: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56]【美】明妮·魏特琳《1938年2月16日之日记》,载《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陆束屏编,伊利诺斯州: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57]【美】明妮·魏特琳《1938年4月11日之日记》,载《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陆束屏编,伊利诺斯州: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58]【美】明妮·魏特琳《1938年4月15日之日记》,载《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陆束屏编,伊利诺斯州: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59]【美】明妮·魏特琳《1938年2月23日之日记》,载《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陆束屏编,伊利诺斯州: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60]【美】明妮·魏特琳《1938年5月13日之日记》,载《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1937-1938年日记和书信》,陆束屏编,伊利诺斯州: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

[61]【美】明妮・魏特琳《沦陷区的教堂：以南京为例》魏特琳手稿，藏全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图书馆，第1盒，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62]【美】陆束屏《明妮・魏特琳经历的恐怖南京——

1937 - 1938 年日记和书信》前言，第 27 页。

[63] 郭静怡《东西方相会》，马里兰州：巴尔的摩，1985 年版，第 55 页。

（责任编辑：江河）

## Courage Under The Reign of Terror

——Minnie Vautrin's Efforts in Protecting Women Refugees from Japanese Atrocities dur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America] Lu Suping edited translated by Wang Shanfeng

(1.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Lincoln, Professor, U. S. A.)

(2. Memorial Hall of the Victims in Nanjing Massacre by Japanese Invaders, Librarian, Nanjing, 210017)

**Abstract:** The summer of 1937 witnessed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Sino - Japanese War. As Japanese troops advanced through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 they committed atrocities, which culminated in cruelty and scale at Nanjing after its fall, with rampant mass executions, raping, looting, and burning. Minnie Vautrin, an American missionary educator in the fallen city, responded to the carnage with courage and bravery. She turned her Ginling College campus into a refugee center to provide shelter, food, and protection for ten thousand terror - stricken women and children. She worked hard and persistently even at the risk of her own safety. Her courage under the reign of terror distinguished itself to such an extent that she was remembered as the goddess at the Nanjing Massacre after her tragic death.

**Key Words:** Minnie・Vautrin; Nanjing Massacre; Ginling College; Reign of Terror

## ミニー？ ヴォートリン氏と血にまみれる程の恐怖 に覆われる金陵女子大学難民キャンプ

陸束屏<sup>1</sup> 文 王山峰<sup>2</sup> 訳

(1. 米国ネブラスカ大学教授 リンカーン)

(2. 侵華日軍南京大虐殺遇難同胞記念館館員 南京 210017)

要旨：1937 年夏、第二次中日戦争が勃発、日本軍は長江下流を遡り南京へ進軍する途中、一シリーズの暴行を犯した。虐殺、強姦、略奪、放火の暴行は南京陥落の後に最もひどい状況になった。大虐殺に対して、南京に滞在していたアメリカ宣教師、教育者のミニー？ヴォートリン氏が勇気を持つ対処した。氏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を難民キャンプに改造し、恐怖に陥る一万人以上の女性と子供に安全な住む場所、食べ物を提供し、例え自身が危険にさらされても氏は努力しつつあった。氏の努力は永遠に南京市民の記憶に留まる。

キーワード：ミニー？ヴォートリン、南京大虐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恐怖な統治

## 공포통치하의 용기

——난징대학살기간 비트린여사가 보호한 여성 난민 일본의 폭행을 받지 않도록 한 노력

루수핑(陆束屏)<sup>1</sup>글 왕산봉(王山峰)<sup>2</sup>번역

(1. 미국 네브래스카대학교 교수 링컨 68501)

(2. 난징대학살조난동포기념관 관원 난징 21017)

요점: 1937년 여름, 2차중일전쟁폭발하였다 일본군은 장강을 따라서 난징을 진공하는 과정에 많은 폭행을 저질렀다. 이러한 학살, 강간, 약탈은 난징이 함락된후 고조에 이르렀다. 미국의 선교사, 교육자 비트린 여사는 난징에 남아서 용감히 난징대학살에 저항하였다. 그는 진링여자문리학원을 난민영으로 개변시키고 만명에 달하는 부녀자들과 아동들을 보호해주었다. 그의 자신의 안전도 넘두에 두지않고 피비린내 나는 난징대학살에서 보여준 용기는 중국사람들이 영원히 명기해야 할바이다.

키워드: 비트린, 난징대학살, 진링여자문리학원, 공포통치

---

【上接第46页】

## 평등산 참안과 난징대학살의 공성을 논함

왕산봉(王山峰)

(난징대학살조난동포기념관 관원 난징 210017)

요점: 1932년 9월 16일에 발생한 평등산참안과 1937년 12월에 시작된 난징대학살은 일본침략군이 국부침략과 전면침화 단계에 제조한 두차례의 대표성있는 학살이다. 이 두차례의 학살은 부동한 역사단계, 부동한 원인과 전략의도를 가지고 있고 학살규모와 내용방면에서 부동점을 보여주었지만 일본군의 학살준비, 학살과정 및 제 3자의 개입 등으로 볼때 이 두차례의 학살은 공통성을 가지고 있다. 이 두차례의 학살은 일본군 침화기간 중국에서 중국인민에 대한 폭행이라는 공통성으로 일본이 전쟁, 폭행과 역사 관념 등 방면의 인식을 보여주었다.

키워드: 평등산참안, 난징대학살, 공통성